

待亚洲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视角和出发点，分析他们自殖民主义时期以来在亚洲运作的基本政策、各种具体策略和手法，分析这些关于“族群”的观念是否有什么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努力寻找在传统欧洲和美国的族群观念中可以与中国关于族群的“多元一体”观念相互沟通的渠道，这对于 21 世纪中地球的人类、各个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家族研究的进展

麻国庆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副教授

自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的家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社会学对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问题等方面，这个家庭是一具体的生活单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5 城市家庭调查、跨省农村调查中的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方式研究以及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等。这个时期对于家庭的研究，也由开始时纯粹以问卷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相对宏观的研究，转向与具体的社区研究相结合。

对于这一社区研究起推动作用的应为费孝通教授对江村的半个世纪的有关家庭变迁的追踪调查，费先生以其睿智，通过对江村以及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家庭中的“反馈模式”理论。这种思考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家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特别是家的观念对家庭结构及生育观念的影响。围绕着这一问题，很多研究者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如社会思想史、历史学等角度，发表了有关的研究成果。

对于家观念的研究，如果脱离农村社会的结构这一基础，其研究也很难有深度。90 年代以后，很多研究者进入农村，开始尝试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家的观念在农村社会的具体体现。当然，这个时期，来自国外以及港台对有关汉族社会的家族的研究理论与田野工作，也更加激活了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农村社会的集团组织——华南宗族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族的复兴与社区重构等方面。近几年来的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博士论文，开始从几个方面展开对家族的研究，如从家—家庭—宗族—姓这一内在结构上，以分家为嵌入点来分析家的运行机制及与整体社会的关系；从家族成员的理性行动与家族群体的自觉生长视角，展开对村落家族群体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田野材料，能以小见大、以大见小、大小互见。

家族人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其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国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家族性，也使得一些企业、农牧场等一些单位，也深深地打上了家族的烙印，特别是边区企业以及三线国营大中型企业。

中国的企业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充满了复杂的社会人文因素。费先生有关“企业办社会”的研究，为进一步拓展企业中的家族化和情缘化的研究起了破题引路的作用。

汉族的家族研究，如单单从汉族自身内部进行研究的话，可能存在着很多缺陷。这是因为中国的民族构成是多元一体格局，汉族是一文化凝聚的中心；同时，汉文化圈中的东亚社会，强烈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对于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如果以认识这些社会结构的关键词“家”为嵌入点，以一种从周边看中心，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建立我们的比较社会研究的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认识汉族的家族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家族体系。



总之，中国社会学的家族研究，在这 20 年中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使其研究从平面的、较为单一的视角，逐渐进入到立体的多维视野之中，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在家族研究中得以张扬和发展。

技术与社会

刘世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副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副所长

当前，几乎是持续不断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运用正在并且必将进一步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孕育了社会学的诞生，并且造就了像马克思、韦伯这样伟大的古典社会学家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当前正在持续演变的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将很能引发一场社会学的复兴。这场复兴将汲取古典社会学中的许多营养，但会有自己的主题。如果说，古典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经济与社会”，那么，复兴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将是“技术与社会”。

事实上，一些重要的著作已经开始出现。克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1996 年推出的三卷本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就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该书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兴起》出版后，吉登斯在书评中将之与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类比，以突出其重要性。我想，对社会学来说，这仅仅是征兆。

在中国，与高技术相联系的社会学研究近年零星开始出现，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陈立辉同学的硕士论文便初步探讨了网络对人们交往方式的影响（1998）。但总起来说，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的学术敏感性是相当低的。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十分重视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的难得的研究场域，将其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富矿，以此为背景产生了一些以“中国特色”为标志的学术成果。而现在，另一个更大的、有长期开采价值的富矿正在出现，开采这个富矿的学术成果，将不仅是“中国特色”，而是与人类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相联系的社会学的复兴。对此，中国的社会学家应有所作为。

固然，对“技术与社会”这一矿藏的开采，有一部分是可以用社会学的“常规视角”来处理的。但必须看到，我们将面对一些人类社会的新的根本性问题，社会学要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将发生变化。在这里，我想以“小概率，大事件”问题为例来陈述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的特点。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起关注的主要是大概率事件，而偶发的小概率事件通常被略而不计。但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在高技术时代可能会出现重大的疏漏。在高技术时代开发出能造成重大社会和生态后果的技术，制造出这样的产品，并不是困难的事。同时，这样的技术和产品的掌握者也大大增加，不仅包括政府，而且也包括公司、个人等。虽然对高技术做不顾社会后果甚至反社会开发和利用概率很小，但一旦出现，后果却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社会在获得高技术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高技术所可能造成的恶性后果的风险。技术本来就是双刃剑，不断创新和改进的高技术意味着剑刃日益锋利。“小概率，大事件”将越来越成为不



可回避的问题。

这里就出现了技术的社会控制问题。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家研究过的社会控制机制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市场机制。这是一种事后调节机制，它对于预防“小概率，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无效的；二是法律。但法律并未有效制止诸如电脑“黑客”和恐怖活动的现实，说明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三是政府控制。在依靠民间技术创新的时代。政府对技术的垄断越来越困难。而且政府控制还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四是社会道德。但社会道德约束是松散的。五是决策程序制约。一般说来，集体决策的程序较复杂，制约因素较多，造成毁灭性后果决策的可能性较小，而个人决策则没有这种约束。问题是，毁灭性技术向私人，包括私人公司的扩散，出现了对它的使用由个人做出决策的可能。

举出诸种控制的缺陷并不是要证明悲观结论。而是说明，在面对新的问题时，以往的基础性研究是很不够的。社会学家需要更大的智慧。

我看中国社会心理学

方 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社会心理学，作为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生物潜能、文化限度和社会情境的理智探求，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它已经在科学共同体中赢得了自身独具的合法性与学科尊严，也在公众中获得崇高的社会声望。在未来的时段中，她将继续在理论建构，学科方法体系的完善及实践应用诸方面获得突破和进展。

1. 理论建构 以社会的延续及个体的独特性之间的悖论作为基本理论问题，社会心理学将会在已有的中层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动物行为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的智慧传统和研究实践，建构统一的社会行为论。这需要对已有的三种面向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框架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社会心理学和情境社会心理学进行重新构造，从而为人类个体和群体在实际的社会互动情境中的社会行为及其限度提供科学的解释、说明和预测。
2. 方法体系的完善 社会心理学将会迈入一个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没有一种方法会在整个方法体系中占据独断地位。偏好不同方法的学者将会密切合作而友善对话。同时，新的研究技术将被构造出来，并且产生重要影响，如元分析技术（meta-analysis）和话语分析技术。
3. 实践 社会心理学家将逐渐走出书斋，以二战期间的入世关怀为模板，去关注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如全球化及信息、人口膨胀及老龄化，环境及生态危机，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及社会不平等。

中国社会心理学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遭遇了困境和挑战。

1. 学科的基本制度结构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及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已经成立，并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规划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关的学科教学和科研机构制度和制度正在完善：规范化的学科培养计划如博士后研究、硕士、本科和职业培训体系正在形成：相关的基金资助的力度正

